



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驱动路径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祝良¹, 黄亚玲^{2*}

摘要: 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比较(fs/QCA)对我国 31 个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旨在揭示全民健身参与度影响因素的复杂互动机制,并获得多重条件的联动适配方式,以寻求提供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差异化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其一,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是提高我国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核心动力,而健身指导水平和组织建设基础是助力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辅助力量。其二,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存在两条驱动路径:一是“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由政策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构成;二是“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由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和健身指导水平(或全民健身组织建设基础)构成。其三,条件组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替代关系。

关键词: 定性比较分析;全民健身;场地供给;健身指导;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23)04-0033-09
DOI:10.12064/ssr.2022120401

A Study on Ways to Increas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ZHU Liang¹, HUANG Yaling^{2*}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Using fs/QCA to conduct a hist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cases of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in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we aimed to reveal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and obtain the linkage adaptation methods of multiple conditions in order to seek differentiated ways to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policy support, venue supply capacity and recreational consumption level a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in China, while fitness guidance level and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are the supporting forces to help improve the rate of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Secondly, there are two ways to increase th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ne is "policy support + economic support", which is relevant to policy support and recreational consumption level; the other is "policy support + resource supply", which consists of policy support, venue supply capacity and fitness guidance level (or national fitnes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Thirdly, there is a potential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dition groups.

Keywor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national fitness; venue supply; fitness guidanc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2020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20 年 7 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 37.2%,与 2014 年调查相比,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增长 3.3 个百分点。体育参与是促进社会资本生成进而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路径和方式^[1-2],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数量则是衡量

收稿日期:2022-1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T005)。

第一作者简介:祝良,女,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全民健身发展与社区体育治理。E-mail:20081988z@163.com。

* 通信作者简介:黄亚玲,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社会组织与奥林匹克运动。E-mail:bjhyl2008@163.com。

作者单位:1. 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校本部),河南 郑州 450001;2.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故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提高,既关乎体育强国建设,也事关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这一议题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单因素的影响机制,较少有对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的解释。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组态视角被广泛应用,它通过整体分析和案例间比较,揭示影响结果的重要条件间的组态效应,发现产生合意结果的多重组合路径^[3]。基于此,本文将在各省区市提高其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实践场景下,从组态视角出发,实证探讨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驱动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将尝试回答,影响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条件组态是什么,哪些条件在其中发挥着更加关键性的作用。

1 文献回顾

全民健身是一项由体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覆盖全体公民的大型社会民生工程,它以贯彻和落实国家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法规为主要工作内容,通过构建满足群众需求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大众科学地参与运动、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达到改善和提高健康水平的目的^[4]。因此,影响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陆雯等^[5]通过纵向干预实验,得出政府和社会(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团体和单位等)在促进群众体育参与中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Eime等^[6]认为,体育政策需要更加重视基层参与,并支持体育组织优先解决青少年的留守问题,尤其提高女性体育活动的参与水平。向祖兵等^[7-8]认为,建立完善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体系 and 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有利于群众体育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进而促进群众体育参与。于善旭^[9]认为专业的体育志愿服务,是面向社会公众、符合追求健康、建立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的基本需要。Vail^[10]指出,体育组织可以通过为社区提供结构化的服务来提高大众的体育活动参与率。King等^[11]通过研究发现,运动生活方式的推广,有利于提升年轻人的参与度,因此指出,将休闲空间或活动的提供纳入到国家政策中,以保障参与群体有设施可利用。孙伏友等^[12-13]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得出刺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提高体育场(馆)开放比例,是我国发展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的动力机制。陈元欣等^[14]认为提高人口可持续消费能力有利于扩大我国自行车运动的参与人口。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丰富和加深人们对于全

民健身参与度影响因素的认识和理解上提供了诸多素材,主要探究了政策、体育场地、居民消费水平、体育社会组织和专业化指导等方面对于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影响。但是多数研究基本循着“现状描述—问题(成因)分析—对策(建议)提出”这一逻辑主线,即聚焦于全民健身参与的实践归纳和描述性总结,然后找出存在问题剖析成因,最后提出优化路径。而依托经验素材的实证探讨,以及对于相关理论的边际知识积累则尤为欠缺。也就是说,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诸多潜在要素的单一价值,而忽视了全民健身参与的资源分配和政策环境的整合性分析,也缺乏对多重条件之间协同效应的系统性梳理。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的实际运用中,条件选择一般有5种方法,即问题导向法、研究框架法、理论视角法、文献归纳法以及现象总结法^[15]。鉴于此,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省区市政府的制度情境与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实践场景,选择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健身指导水平、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5个因素作为条件变量,展开QCA分析。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模糊集定性分析比较(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展开实证检验,探索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多元驱动机制。QCA于1987年由查尔斯·拉金(Ragin)提出,是一种基于集合理论的、以案例研究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QCA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抗争事件、政府治理、管理绩效和技术应用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逻辑,是一种超越定性 with 定量研究的新方法^[16]。

在QCA分析中,研究者采用多个案例,以逻辑条件组合为基础,进行同一模式内不同个案之间以及不同模式之间的比较^[17],从而找出不同条件如何进行匹配以实现更优的结果^[13]。也就是说,在多个条件变量中,找出哪些组态可以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哪些组态又会导致结果变量的消失,然后在明确因果关系复杂性的前提下,判断多重条件变量之间的协同效应。不管是与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还是以个案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相比,QCA都表现出独特的优势:一是运用跨个案比较,可以是中、小等样本,避免了单一分析的面向,研究者在挖掘出条件变量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实证



结果的外部推广效度;二是组态视角的分析,能够找出具有等效结果的不同条件间的组合方式,以加深理解不同案例场景下结果出现差异化的驱动机制,并能进一步探讨条件间的潜在替代关系;三是在“因果关系不对称”的情况下,运用导致结果出现与消失的条件组合,能拓展对特定研究问题的理论解释维度。

2.2 数据及校准

2.2.1 结果变量

本文所关注的结果是全民健身参与度。2022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一目标出发,要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改善人民健康状况,进而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人口基数相当大的中国来说,锻炼人数比例的小幅提升,将是数字上巨大的进步,且其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国人真正把体育或者参与锻炼,当成一种生活方式^[18]。因此,本文采取2020年各省区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作为该地区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发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

2.2.2 条件变量

(1)政策扶持力度。面对不断攀升的慢病发生率和巨额医疗支出,传统的全民健身运行模式需要在体医融合的助推下实现“聚焦健康、联合行动、全民覆盖、精准发力”的重大实效化转型^[1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健康服务。”那么人民群众健身难问题的解决,势必需要完善且有效的政策进行推动,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依托健全的全民健身政策体系,政府各部门的资源得以统筹协调,进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因此,政策的扶持在促进全民健身参与度中发挥着支撑性作用。故本文选择各省区市在2016—2020年(一个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周期)发布的有关全民健身政策的总数作为该地区政策扶持力度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政府门户网站和体育局官方网站。

(2)场地供给能力。近年来,通过国家顶层设计和地方扎实推进,我国体育场地在质和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健身需求,健身场地设施还存在总量不

足、质量不高、结构失衡、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0]。然而,体育场地设施作为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载体,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故打通全民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促进健身环境明显改善,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营造群众普遍参加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于是本文选取2020年各省区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作为该地区场地供给能力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

(3)健身指导水平。一方面,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另一方面,老年群体的基数越来越大且人均寿命逐渐提高,休闲之余,老年人更多选择参与体育活动。然而,与此同时却发生了诸多健康风险事件,如运动型疾病、损伤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导致人们的健康受到威胁^[21]。这是由于人们参与体育锻炼时,既缺乏专业的指导,也缺乏相应的安全知识,在风险发生后更没有应对经验,即全民健身活动的参与表现出的业余性,无疑会影响到居民的参与热情。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群众身边的专业健身指导队伍,对于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提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2020年各省区市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作为该地区健身指导水平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

(4)组织建设基础。《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健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的体制机制。全民健身组织不仅是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供给主体,还是全民健身管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且全民健身组织体系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与促进全民健身目标的达成,提高整个国家民众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22]。故全民健身组织的建设基础是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选择2020年各省区市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注册为法人)数作为该地区全民健身组织建设基础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

(5)文娱类消费水平。由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既有免费供给的内容,也有公益收费供给的内容,然而鉴于体育消费是一种非必需消费,其不仅受到消费观念的制约,更受到消费水平的影响。体育消费占比滞后问题直接影响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3],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消费也构成了体育产业的一部分。



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无疑对大众的体育消费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被包含在文娱类消费需求中^[24],故居民的文娱类消费水平也成为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取 2020 年各省区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该地区文娱类消费水平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1》(2020 年数据)和国家数据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在 fs/QCA 中,校准是指给所要研究的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一个过程^[25],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处于 0~1。校准是为了判断某个数值的位置及其具体含

义,也就是说这个数值在多大程度上隶属于高分数或者低分数集合。根据案例中各变量的实际取值分布情况,本文主要运用常规直接校准的方式,而对于 3 个锚点的选择,即“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则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以及案例的数据特征,全民健身参与度、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健身指导水平、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 6 个变量分别采取样本数据 75%、50%和 25%的分位数,即 0.75、0.50、0.25^[26]。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测量指标描述以及锚点的确定见表 1,使用 fs/QCA 3.0 软件进行分析。

表 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指标描述与校准

Table1 Description and calibration of the result and condition variables

变量	指标描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全民健身参与度	2020 年各省区市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	40.15	36.40	32.30
条件变量 政策扶持力度	2016—2020 年各省区市发布的有关全民健身政策文件的总数 / 份	12	7	3
场地供给能力	2020 年各省区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m ²	2.335	2.270	1.435
健身指导水平	2020 年各省区市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 / 人	2.590	2.270	1.435
组织建设基础	2020 年各省区市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注册为法人)数 / 个	0.432 8	0.334 2	0.209 1
文娱类消费水平	2020 年各省区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 /%	20.32	18.22	11.19

3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对 5 个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表 2),结果显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临界值 0.9,这表明不管是对于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参与还是低水平的全民健身参与,都不存在解释其结果的单一必要条

件。同时也说明了影响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因素的复杂性,即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健身指导水平、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这 5 个条件需要彼此联动匹配才能够共同发挥作用,也就是经由多重条件的并发协同效应以形成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驱动机制。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

Table2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条件变量	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		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政策扶持力度	0.753 14	0.802 87	0.485 21	0.394 80
低政策扶持力度	0.432 29	0.523 85	0.757 73	0.700 86
高场地供给能力	0.735 00	0.789 81	0.485 80	0.398 45
低场地供给能力	0.440 19	0.528 66	0.743 72	0.681 74
高健身指导水平	0.710 43	0.724 86	0.563 46	0.438 80
低健身指导水平	0.449 97	0.574 55	0.646 70	0.630 26
高组织建设基础	0.652 52	0.640 50	0.686 27	0.514 15
低组织建设基础	0.505 03	0.678 36	0.520 16	0.533 27
高文娱类消费水平	0.636 54	0.599 38	0.733 29	0.527 02
低文娱类消费水平	0.497 70	0.570 97	0.442 58	0.481 71



3.2 条件组态分析

构建真值表,即通过布尔简化来确定合适的路径,其中选取的一次性阈值为 0.8,频数阈值为 1,真值表结果见表 3。然后采取查尔斯·拉金^[27]所提出的 QCA 分析结果的呈现方式对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组态分析结果进行展现,即●表示条件存在,也就是条件变量的取值较高,其中●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表示条件缺失,其中⊗表示“核心缺失条件”,⊗表示“边缘缺失条件”;而空格则表示该条件存在与否对于结果来说无关紧要。由表 4

数据可知,能够解释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驱动路径有 3 条,其中每一纵列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条件组态,即共有 3 种组态。解的一致性为 0.915,表明在所有满足这 3 种条件组态的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的案例中,91.5%的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解的覆盖度是 0.574,表明 3 种组态条件可以解释 57.4%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在条件组态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索出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健身指导水平、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在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中的差异化适配关系。

表 3 真值表
Table3 The true value table

案例数量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政策支撑力度	场地供给能力	健身指导水平	组织建设基础	文娱类消费水平	全民健身参与度
3	1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1	1
2	1	0	0	0	1	1
1	1	1	0	1	0	1
3	1	1	1	0	0	1
1	0	1	0	1	1	0
1	1	1	0	1	1	0
1	0	1	1	1	0	0
1	0	1	1	1	1	0
1	0	1	0	0	1	0
1	1	0	0	1	1	0
1	0	0	0	1	1	0
1	0	0	1	1	0	0
1	1	0	1	1	1	0
1	1	0	1	0	0	0
2	0	0	1	1	1	0
2	0	1	0	1	0	0
1	0	0	1	0	1	0
2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表 4 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组态分析

Table4 Group analysis of high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条件组态	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	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政策扶持力度	●	●	●
场地供给能力		●	●
健身指导水平	⊗	●	
组织建设基础	⊗	⊗	●
文娱类消费水平	●		⊗
一致性	0.896	0.854	0.941
覆盖度	0.211	0.229	0.320
唯一覆盖度	0.127	0.099	0.209
解的一致性		0.915	
解的覆盖度		0.574	



在条件组态 1 中,场地供给能力这一条件无关紧要,政府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均发挥着核心作用,不存在全民健身组织建设的核心作用和健身指导水平的补充作用。这表明不管该省区市的场地供给能力如何,即使面临较低的健身指导水平和薄弱的组织建设基础,如果其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并且能够提高文娱类消费水平,那么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能够得到提高。在条件组态 1 中,需要政策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两个条件联动适配才能发挥作用,而文娱类消费水平则是地区经济水平的一个缩影,故这里将这一组态命名为“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此外,该路径的覆盖度为 0.211,表明其能够解释约 21.1% 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包括河北、湖南和广西等(图 1),其中约 12.7% 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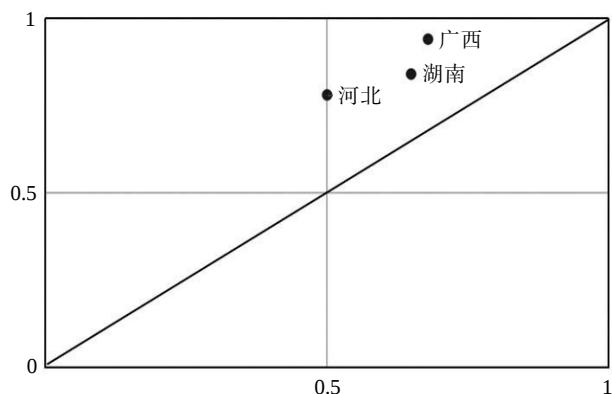


图 1 条件组态 1 的解释案例

Figure1 Interpretive case of Condition Group1

条件组态 2 与条件组态 1 一样,政府扶持力度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不同的是,场地供给能力同样发挥着核心作用,此外健身指导水平发挥着补充作用,不存在组织建设基础的核心作用。这表明不管该省区市文娱类消费水平如何,即使面临薄弱的组织建设基础,只要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和场地供给能力,并提高健身指导水平,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就能得到提高。在条件组态 2 中,需要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和健身指导水平 3 个条件联动适配才能发挥作用,而因为场地和健身指导都包含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六大内容内,它们都属于全民健身的资源,故这里将这一组态命名为“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此外,该路径的覆盖度为 0.229,表明其能够解释约 22.9% 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包括北京、陕西和天津等(图 2),其中约 9.9% 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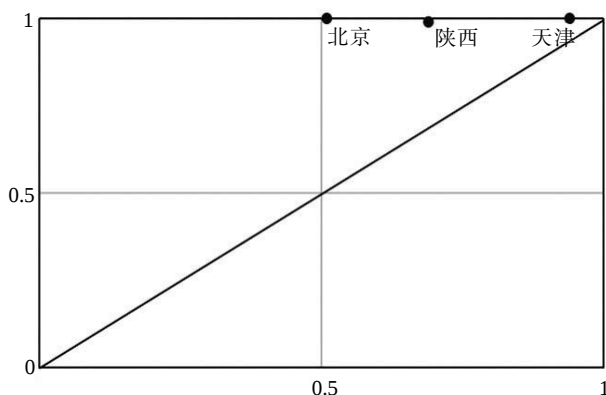


图 2 条件组态 2 的解释案例

Figure2 Interpretive case of Condition Group2

在条件组态 3 中,政府扶持力度和场地供给能力均发挥着核心作用,而组织建设基础发挥着补充作用,不存在文娱类消费水平的核心作用。这表明在政策扶持力度大且场地供给能力强的省区市,即使其文娱类消费水平较低,若能夯实组织建设基础,那么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也能得到提高。在条件组态 3 中,需要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和组织建设基础 3 个条件联动适配才能发挥作用,而因为场地和组织都包含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六大内容内,它们都属于全民健身的资源,故这里也将这一组态命名为“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此外,该路径的覆盖度为 0.320,表明其能够解释约 32% 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包括浙江、江苏、福建和上海等(图 3),其中约 20.9% 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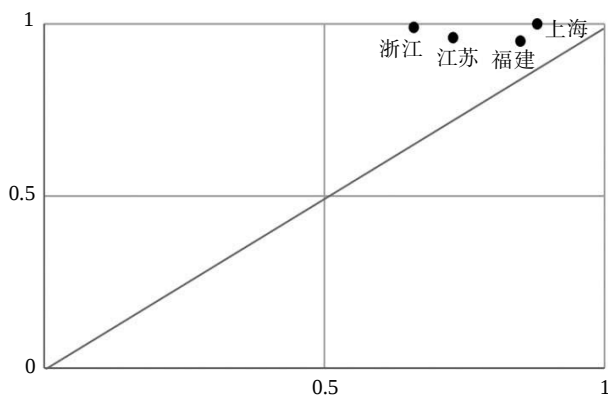


图 3 条件组态 3 的解释案例

Figure3 Interpretive case of Condition Group3

3.3 条件间的潜在替代关系

通过对条件组态 1~3 的异同比较,可以进一步识别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健身指导水平、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条件的潜在替代关系。首先,对比条件组态 1 和条件组态 2,发现对于同样具有高政策扶持力度以及低组织建设基础的省

区市,高文娱类消费水平和低健身指导水平两个条件的组合可以与高场地供给能力和高健身指导水平两个条件的组合相互替代(图4)。其次,对条件组态2和条件组态3的比较,发现对于高政策扶持力度的省区市,且同时具有高场地供给能力,高健身指导水平和低组织建设基础两个条件的组合可以与高组织建设基础和低文娱类消费水平两个条件的组合相互替代(图5)。最后,对条件组态1和条件组态3的比较发现,在同样高政策扶持力度的省区市,高文娱类消费水平、低健身指导水平和低组织建设基础3个条件的组合可以与高组织建设基础、高场地供给能力和低文娱类消费水平3个条件的组合相互替代(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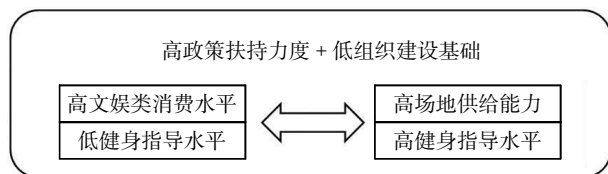


图4 条件组态1与条件组态2的替代关系

Figure4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ition Group1 and Condition Group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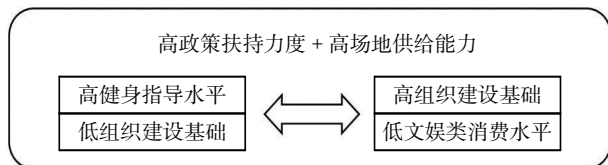


图5 条件组态2和条件组态3的替代关系

Figure5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ition Group2 and Condition Grou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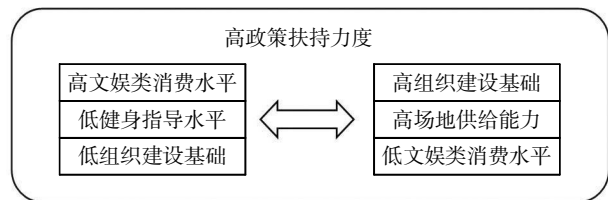


图6 条件组态1和条件组态3的替代关系

Figure6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ition Group1 and Condition Group3

通过组态之间的两两对比,即探讨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组织建设基础、健身指导水平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条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发现政策扶持力度这一条件始终都没有被替代,这表明其在推动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该条件不具备,即使其他条件再优越,也无法实现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目标,而其他条

件组合之间则可以替代。也就是说,各省区市在推进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另外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配适方式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最后,对结果变量的“否集”(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展开条件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具有两条路径(表5)。其中高场地供给能力和高组织建设基础成为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补充条件,驱动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条件并不是导致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反面条件,从而很好地说明了QCA的因果不对称性特点。

表5 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组态分析

Table5 Group analysis of low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条件组态	组态1	组态2
政策扶持力度	⊗	⊗
场地供给能力	⊗	•
健身指导水平	⊗	⊗
组织建设基础	⊗	•
文娱类消费水平		⊗
一致性	0.889	0.893
覆盖度	0.264	0.181
唯一覆盖度	0.203	0.121
解的一致性	0.911	
解的覆盖度	0.385	

4 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驱动路径

4.1 “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驱动路径

从条件组态1结果可知,政策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是影响该类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重要因素,这为那些全民健身公共资源包括场地、组织和健身指导等较为缺乏的省区市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实践路径,即在强有力和健全的政策扶持下,通过刺激城镇和农村的文娱类消费,可以有效促进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分析这一驱动路径解释案例(图1),可以发现这些省区市的整体经济实力都不在全国的上游行列,但是它们拥有较高的文娱类消费水平。以湖南为例,在体育发展“十三五”期间,湖南省政府部门发布全民有关的政策文件近十份,如《关于加快发展湖南省冰雪运动的实施意见》《湖南省体育强省建设规划(2020—2030年)》《湖南省省本级政府购买群众性体育活动组织与承办服务实施办法》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等,为居民参与全民健身提供了



政策保障。此外,2020年,湖南省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24.5%,位居全国榜首。文娱类消费水平的提升,不仅反映了该地区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还体现了文娱类消费作为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可,这无疑为居民参与付费类全民健身活动赛事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驱动路径中的经济支撑,并不是指某省区市的整体经济实力,而是指其文娱类消费水平。

4.2 “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驱动路径

条件组态2和条件组态3共同构成了“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驱动路径。从组态条件分析结果可知,两者之间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共同点是,政策扶持力度和场地供给能力在促进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既印证了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解决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也佐证了国家通过多措并举的手段推进体育场地建设的适时性和精准性。故在“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驱动路径中,除了政策扶持力度这一条件外,体育场地供给能力是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不可或缺的又一个条件,而健身指导水平和组织建设基础则可以替代,该驱动路径所能解释的案例如图2、图3。如寸土寸金的北京,充分挖掘城市可利用的土地和空间,不断创新全民健身新载体,在城市大小公园里建设了新一代智能化全民健身步道,在首钢园区打造了一批体育场馆群等。2020年北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45 m^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5 m^2 (202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2.20 m^2)^[20],而其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注册为法人)数为0.33个。再如浙江和上海,在政策扶持方面,这两个地区发布全民健身有关政策均超过了10份;在场地供给方面,浙江的“百姓健身房”案例,被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采纳;在组织建设基础方面,上海形成了以街道为依托并实现全覆盖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管理模式等。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1)政策扶持力度、场地供给能力、健身指导水平、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多重并发”,形成驱动我国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多样化组态形式。5个条件共同发挥作用,任何单一条件都不能构成驱动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引致省区市对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

驱动路径选择的充分条件。

(2)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驱动路径的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存在3条等效路径,并且3个条件组态之间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构成了“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和“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两种驱动路径,这一结论在区域异质性条件下有力地说明了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拥有多种路径。其中政策扶持力度这一条件无法被替代,说明其在推动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5.2 局限与展望

(1)基于政策扶持力度在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中的支撑性角色,不同省区市应合理科学地制定与本地区发展实际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健全全民健身政策保障制度。然而政策工具包括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等,不同政策工具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如何发挥政策工具的组合驱动效应,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展开。

(2)由于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了文娱类消费水平这一指标来间接反映该省区市的体育消费水平,显然不够精准。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组态分析中,文娱类消费水平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鉴于此,一方面各省区市可以通过打“组合拳”的方式刺激当地居民的文娱类消费,尤其是体育领域的消费;另一方面后续研究则可以深入挖掘体育消费的数据,并进一步探索其在促进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黄谦,张晓丽,葛小雨.体育参与促进社会资本生成的路径和方式: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9,55(7):63-70.
- [2] 张晓丽,张义祥,杜夏雨.体育参与何以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社会资本中介效应[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46(4):28-39.
- [3]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285(6):155-167.
- [4] 卢文云,陈佩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内涵、路径与体制机制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5):25-39,55.
- [5] 陆雯,惠悲荷,刘伶燕.群众体育参与动力的有效引导机制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21,57(5):18-27.
- [6] EIME R, HARVEY J, CHARITY M, et al. Population levels of sport participation: Implications for sport policy



- [J]. Journal of Science & Medicine in Sport, 2016, 16(1): e34-e34.
- [7] 向祖兵,李骁天,汪流.社区—社会体育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联动运行机制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7,40(9):23-28,38.
- [8] 向祖兵,汪流,李骁天,等.“三社联动”视角下社区体育网络体系的模式与机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 34(5):546-551.
- [9] 于善旭.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纳入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探讨[J].体育学研究,2018(3):37-47.
- [10] VAIL S 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port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2007, 21:571-596.
- [11] KING K, CHURCH A. Questioning policy, youth participation and lifestyle sports[J].Leisure Studies, 2015, 34(3):282-302.
- [12] 孙伏友,侯洁.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发展目标科学性分析[J].体育科学,2012,32(1):34-39.
- [13] 孙伏友,侯洁.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的发展动力机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5(2):121-124,137.
- [14] 陈元欣,邱茜.消费升级视域下我国自行车运动参与人口的消费水平和群体特征[J].体育学研究,2019,2(4):44-50.
- [15] 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16(9):1312-1323.
- [16]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杜运周,李永发,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7.
- [17] 李蔚,何海兵.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逻辑及其应用[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16(5):92-100.
- [18] 小央.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生活体育,让生活更加美好[EB/OL].(2022-06-25) [2023-12-02].<https://new.qq.com/rain/a/20220625A09H>
- 2200.
- [19] 王正伦教授:健康中国背景下“全民健身”的实效化推进政策[EB/OL].(2018-04-21)[2022-12-02].https://www.sohu.com/a/228985405_613653.
- [20] 郑家鲲,冯俊翔.牵住“牛鼻子”,着力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EB/OL].(2022-04-05)[2022-12-02].<https://m.gmw.cn/baijia/2022-04/05/35635329.html>.
- [21] 杨寿强.国民健康运动风险与治理问题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2017,37(3):10-12,16.
- [22] 马杰华,舒为平,王佳.西部城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与效能提升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J].体育学刊, 2021,28(1):85-90.
- [23] 李凌,曹可强,张瑞林.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内涵特征、动力机制与现实路径[J].体育学研究, 2022,36(2):41-51.
- [24] 俞琳,曹可强.消费预测背景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导向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8(5):36-39.
- [25]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23-41.
- [26]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393-420.
- [27] CHARLES C R.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190-212.
- [28] 国家体育总局.2020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EB/OL]. (2021-06-01) [2022-12-02].<https://www.sport.gov.cn/n315/n329/c20908193/content.html>.
- (责任编辑:晏慧)